

要中转之地,柳宗元与刘禹锡第二次又一同被贬,柳宗元被贬广西柳州,刘禹锡被贬广东连州,二人共同从长安出发,同行至衡阳再分途,一个西行一个南行。在衡阳分别时,柳宗元作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刘禹锡回作《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因此,贬谪广东与广西的文人在南贬道路上大多都要经过衡山,坐拥南下两广路途之交汇点的地理位置使得衡山成了许多流贬文人在贬途中的必游之地,他们游历衡山,留下的足迹与诗文,成为南岳文化的传播者。

贬谪之游往往带有思归心绪,而衡山所在之衡阳有回雁峰,传说大雁南飞至此而回,在被南贬文人们看来就更加触发心中的伤感,此情此景往往引发漂泊羁旅之悲和归思乡愁等情思,如柳宗元《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识,正是峰前雁回时。”^[3]就是在经过衡山时发出想念故园之情,以雁回寄寓自己的回归。

(二)山水漫游

唐时国家统一,物质生产丰富,社会生活富足稳定,尤其是盛唐,公私仓廩俱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让人们有条件去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旅游之风尚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悄然成风,除了以长安洛阳周边为主的宴游、郊游,为应举求官、为求荐游走的宦游外,山水游则是唐人漫游的重要部分。南北文化存在的差异触发了文人志士探访异乡的兴趣;山水游是唐代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文人们以畅游天下为标榜,漫游范围很广。衡阳远离京都,但南岳衡山的山水和宗教文化为人们所向往,无论文人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抑或僧人道士,都成为游玩衡山山水的主体,如杜甫、孟郊、李端、张祜、曹松、裴说、贯休、张乔等都曾漫游来过衡山。

如张乔留有诗歌《游南岳》,诗云:“入岩仙境清,行尽复重行。若得闲无事,长来寄此生。涧松闲易老,笼烛晚生明。一宿泉声里,思乡梦不成。”^[3]既写出了游南岳如入仙境一般而希望长住于此的感受,又通过涧松、笼烛、泉声等具体意象的呈现,将南岳之游的所见所闻形象地展现出来。

唐代的文人不乏喜爱参佛参道之人,唐代不少宗教高僧高士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而集佛、道于一身的南岳衡山,成为他们的相交、会聚之地。例如刘禹锡、吕温、刘长卿与南岳衡岳寺灵彻有文学交往;陆龟蒙、司空图、郑谷与齐己相交颇深;“仙宗十友”之一的司马承祯与李白、韩愈、宋之问等都有往来;徐灵期、储光羲、崔涂等人也与南岳道士也有交往。此

类交往也促使许多文士来衡山游山玩水加访友。如齐己就有《荆门送人自峨嵋游南岳》,可以作为此类例证,诗题就表明和诗僧齐己交往之文人,从峨嵋出发来游南岳,诗人也感慨“峨嵋来已远,衡岳去犹赊”。而这不远万里来游衡岳的原因想必与齐己曾在南岳修行有关吧。

(三)祭祀祈福之游

自隋唐确立以衡山为南岳以来,南岳衡山被纳入封建统治者的五岳祭祀体系,因此相关祭祀礼仪,如等级(五岳视三公),在国家祭祀规模中属于中祀等级;祭祀频率,一年一祭,祭祀对象为炎帝与祝融。唐代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根据道士司马承祯的建议,建立了“真君祠”(今南岳庙)。天宝五年,唐玄宗又封南岳为“司天王”。

唐代南岳的祭祀主要有遣使祭祀与委托地方长官祭祀两种。委托地方长官祭祀应该是常制,遣使祭祀则为临时性祭祀,定期的常祀一般由当地的官吏主祭,临祭则会派朝廷的重要官员来此,唐代由此原因来到衡阳的官员有张九龄、张说、归崇敬、李知柔等人。张九龄本身是韶州曲江人,在其上京都求官赴任途中已经到过衡阳,开元初担任宰相,被多次派往南岳担任祭祀主祭。写于来南岳祭祀途中的一首《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其中一句“峽武经陈迹,衡湘指故园”,表明他心中已将衡山与家乡联系在一起,自陕西蓝田长途跋涉来到衡山,相比路上的山山水水,衡山与韶关的相邻,更让他有归属感。

与参与祭祀的人相比,来衡山祈福的则更多。唐人对南岳人文景观文化价值的认识,一是将其视为长寿文化之山。古代星象学认为南岳与主管人间苍生寿命的轸星有对应关系,因而很早衡山就有寿岳之称,这种观念在唐代得以传承,帝王选择在南岳投简以求寿,唐诗中反映出文人也对南岳持有寿岳观念:李白《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开篇两句“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3]突显衡山高峻入天,俯视人间发现自己对应的星宿即是寿星老人星。

其二是认为衡岳是灵岳。山岳神灵的灵验自然与民众信仰的普及密切相关,张九龄将南岳视为灵岳:“将命祈灵岳,回策诣真士。绝迹寻一径,异香闻数里。”^[1](《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他在南岳拜神祈福,就是基于对南岳许愿祈福之灵验的信仰。

这种观念并不是单例,南岳在唐代直接被称为灵岳的诗歌就有数首,如,“常愿入灵岳,藏经访遗踪”^[2],灵岳成为南岳之代称,显示出认同其灵验的信仰在当时社会传播得非常普遍。不仅仅是文人,

民众上衡山祈福求香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风俗,陆龟蒙《寄南岳客乞灵芜香》一句“闻说融峰下,灵香似反魂”表明,民众信仰南岳之灵,已经在当时社会广为传播。

(四)行脚云游

禅宗还是律宗抑或净土宗,在南岳共处而兴盛。就禅宗而言,唐代南岳是南宗五家七宗的发祥地,怀让在衡山修行三十余年,与弟子马祖道一形成南岳系,后马祖道一去往江西弘法;慧思的另外一弟子青原行思,有高足石头希迁,在衡山弘法四十余年,形成青原系。

在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生活的时代,形成以两位禅师居所为中心的江西、湖南交流,这种交流,有的是,两位禅师相互推荐,使禅僧往来于江、湖之间。更多的是,禅僧们在“行脚”时参拜著名禅师而自然形成了“跑江湖”。因唐代江西和湖南、湖北在禅宗传法区域中的重要性和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南宋时“跑江湖”已成为禅僧行脚参禅的代名词^[4]。而跑的这“江湖”中的一方重要据点就是南岳。由此可以想见,唐时南岳是禅僧行脚云游的重要山头,贾岛诗歌《送僧游衡岳》:“心知衡岳路,不怕去人稀。船里犹鸣磬,溪头自曝衣。有家从小别,无寺不言归。料得逢寒住,当禅雪满扉。”^[3]就是南岳在当时是僧人们热衷云游之所的印证。一句“不怕去人稀”,道明在作者心目中衡岳路已是游人众多,这次去云游的僧人不必担心没有同伴。

禅僧们的跑江湖无疑加强了唐人视南岳为佛教重镇的印象,这种跑江湖势必要游南岳的观念由此蔓延到隐居之人。贾岛诗歌《送郑山人游江湖》:“南游衡岳上,东往天台里。足躐华顶峰,目观沧海水。”题目标为送好友隐居之士游江湖,而内容起首即提到南游衡岳和东到天台,显见游衡岳与跑江湖之相关性已得到大众的认同,深入人心。

高僧的南岳行脚云游之盛,让与他们交往的文人印象深刻,如贾岛《酬慈恩寺文郁上人》诗云:“闻说又寻南岳去,无端诗思忽然生。”一个“又”字道出南岳是僧人们多次云游之地。而唐诗中有着数量不菲的送别僧人好友去南岳的诗歌,更是南岳行脚云游之盛的明证。如刘禹锡《送深法师游南岳》,齐己《送禅者游南岳》、《送楚上人往南岳刺血写〈法华经〉》等等,其中周贺的一首《送宗禅师》可为代表:“衡阳到却十三春,行脚同来有几人。老大又思归岳里,当时来漆祖师身。”一句“行脚同来有几人”直接明了地表明僧人来衡山行脚云游已是一种常见现象。

高僧到南岳行脚的风俗,也带动了道士到南岳的云游,唐代的南岳已是一个重要的道教文化中心。南岳有五岳庙中规模最大的南岳大庙(唐开元十三年)、著名道教圣地黄庭观(唐武德元年),除了道观的建成与发展,南岳出现的道教名士也是南岳道教发展的明证。开元初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来到南岳,法从甚众。其弟子薛季昌、王仙舟,亦被封为天师。道教文化的繁荣让南岳也成为吸引道士云游之所。李白的《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就印证了这一现象:“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霓衣不湿雨,特异阳台云。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3]交代了女道士是吴江人,来南岳寻仙,实属远游,由此也说明南岳已成为天下道士所向往的寻仙之地。

二 唐代衡山旅游的特点

唐代衡山旅游种类不少,但唐代衡山并没有形成今天所谓的经典景点、著名景点,故而唐时的衡山旅游并不会是以景点为中心的走马观花。相比今天的景点开发、商业化模式,其时的旅游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一)重体验与感受

虽然唐代衡山之游的种类有不同,但各类旅游有着一个共同点特点,那就是重视体验与感受。其时的文人墨客的旅游,注重获得文化的熏陶,得到精神层面美的感受。

如卢肇《登祝融寺兰若》诗云:“祝融绝顶万馀层,策杖攀萝步步登。行到月宫霞外寺,白云相伴两三僧。”^[3]诗人在历经拄着拐杖,攀着岩壁的藤萝,一步步小心翼翼的万余层艰难攀登之后才登上祝融峰,然而这种艰辛过后带给诗人是如仙境般的美的感受,此间的寺庙如同在天上的月宫之中,僧人们都如驾云腾雾般地飘逸。

除了感受到美,唐人的衡山之游更能体会到与尘世相隔的幽静、淡然、超脱,如张乔《游南岳》:“入岩仙境清,行尽复重行。若得闲无事,长来寄此生。涧松闲易老,笼烛晚生明。一宿泉声里,思乡梦不成。”诗中给人描绘的南岳之游,根本不见什么经典景物,诗歌前四句只着眼于游者的行为和感受,一句行尽复重行,写尽了游人对此处的喜爱和反复体验,而带来这种感受的,只见到山岩、山泉、松树、灯笼,以及由黑夜衬托的烛火的光明、泉水的滴咚声而组合成的光与声的情境,并由此引起的思乡之情。当然作者也交代了能够作这种深入的体验式旅游的前提,是“若得闲无事”。由此可以想见,快餐式的旅

游,赶鸭子式的规定时间类的旅游,难以感受到此等情境。

而僧道们的行脚云游,更是基于对精神世界的陶冶,因而是一种以多日居住,交友访道式的旅居型的旅游,这种更重视在衡山的山水环境中获得某种提升其宗教领悟的灵感,故而亦以体验和感受为重。

(二)喜探寻遗迹

衡山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美丽动听的传说,而传说中的神仙、名人留下各种相关的文化遗迹。而唐代文人们来到衡山,每每都要去找寻遗迹,从而验证各类传说,这些遗迹和传说以舜、大禹、魏夫人为代表。

舜帝南巡至衡山的事迹在不少典籍中都有记载,《尚书·舜典》记载:“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另外《南岳志》记载,安上峰有舜溪、舜井、舜洞等地名,《一统志》也有相关记载。唐代诗人上衡山也会寻找舜帝之遗踪,朱庆余有首《舜井》就是咏叹舜帝遗迹:“碧甃磷磷不记年,青萝锁在小山颠。向来下视千山水,疑是苍梧万里天。”诗歌显示出诗人亲临衡山舜井遗迹,并由舜帝南巡事迹,将衡山与九嶷山联系起来。

据传,在南岳衡山的岫楼峰上曾立有一座大禹亲笔手迹的石碑。唐代文人也都于此有耳闻,刘禹锡“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就很清楚地说明他听说的大禹碑铭在祝融峰,韩愈则为此特意去寻找。其《岫崦山》整首诗歌就是叙述到岫崦峰寻找禹碑一事:“岫崦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3]他听说的禹碑则是在岫崦峰,诗人想象禹碑模样,并说明禹碑所见者少,自己千搜万索都没有寻见。

传说中曾在衡山修行的魏夫人,在唐代文人意识中,也会将其与南岳相联系。李白《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云:“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作为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夫人自然被学道者所追崇,而南岳则是觅其遗踪的去处。杜甫也在眺望南岳时想起了魏夫人:“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3]可见在他心目中,南岳是道教仙山,群仙闪耀。

(三)多重组合性

南岳衡山是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的结合体,唐代文人雅士的衡山之旅,也是在亲近自然与感受人文上都有收获,因此唐代衡山旅游的又一特点就是多重组合性。

一是美景上的多重组合,纵情山水时,往往又寄

意于烟霞,流连于古庙时,亦听闻猿鹤之鸣,远近之美,高低之间,声色之中,无不带着美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诗词中的地理认知客体主要包括山岳、水文、气象、生物、建筑等5种类型^[5]。从这一层面出发,唐人南岳之旅多以两种及两种以上类别的组合形式出现,在相互叠加的感官中获得立体的感知体验。山岳风光与云雾、泉溪、竹、松、猿、鹤、寺庙等多重组合在一起,从而产生诗般的意境与美的感受。

二是情感收获上的多重组合,唐时衡山之旅,既欣赏了美景,也体验了衡山的宗教文化;既找寻了前贤留下的遗迹,又完成了求寿祈福的心愿;既感受了衡山的寺庙生活,也完成了访友拜圣的初衷。

三 对今天南岳旅游开发的启示

(一)策划专题体验型旅游

从唐代南岳的旅行种类来看,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旅游目的。不过与今天的衡山旅游现状相比,他们共同的重视文化体验、山水体验的体验型旅游是今天所缺乏的。当然,当今社会生活速度较快,不是所有的旅客都有心境与时间来静心体验。故而加强体验型旅游,应当策划一些专题性体验旅游,如山居之旅、宗教之旅,这类专题体验型旅游与大众几日游那种区别开来,时间较长,吸引一些有这类需求的各界人士来感受与体验。如山居之旅,在山上将一些民居开发成度假式公寓,在暑期等节假日吸引度假旅游家庭个人来体验山居生活,并结合衡山历史文化古迹,设计具体的体验活动,营造景观还原历史场景,制造一定的体验氛围,将山居生活与文化古迹感受相融合。宗教之旅,则可将体验南岳道教佛教历史与感受今天的寺庙日常修行生活相结合。故而可以修葺与新造一些留存与历史文献之中的宗教文化景观,如除禅宗外,唐代净土宗在南岳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净土宗的三祖四祖都与南岳结缘,因此可以修建相关的纪念性景观,让体验型旅游不只是拘泥于自然山水,还应感受人文历史背景。

(二)景观、环境的多重营造组合

南岳一些著名景点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较高,对游客的吸引力相对较强,但如果仅仅就看这些著名景点,就容易陷入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通观唐人的体验式旅游,大多是建立在景观的多重组合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以著名景点为中心,在保留那些著名景点为旅游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关注与挖掘这些景点周边的新型景观,如山岳型景观配以气象型景观开发,增加人工云雾、烟、雨、冰雕等与之组合;在靠近水源的山岳景观,开发出水文景观与之增色;

在一些植被茂盛的景点,增加生物型景观,可以是石雕型猿猴、松鹤等等,也可以是造型别致的仿动物形状的游乐设施、休息器材。这样,避免总是山岳型景观重复出现而导致游客感觉单调,同时在新开发的组合景观上游乐、休息,增长游客停留时间,从而加强旅游的体验感。

(三)加强历史人文景点的开发

南岳旅游开发现还在多停留于沿着南天门登上祝融峰的主线路登山赏景,外加烧香祈福。实际上,南岳的许多古迹、宗教文化、书院文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有关历史人文景点的开发,衡山已经落后于其他地方,如杭州灵隐下天竺法镜寺根据苏轼所写的《圆泽传》,开发了三生石景点。随着一些影视剧对三生观念的推荐,三生石景点已经成为热门旅游景点。而其实最早的三生石传说,是在衡山。南朝慧思大师在衡山留下了三生故事的传说,唐代齐己有诗云,“自抛南岳三生石”。到宋代惠洪《冷斋夜话》说“东坡删削其传,而曰圆泽,而不书岳麓三生石上事”^[6]。可见从唐至宋的僧人都认定三生石在南岳。而杭州天竺寺仅根据苏轼一篇传记就开发了景点,而衡山有慧思的三生藏等真实古迹,以及唐诗宋文之记载,却到今天还没有开发出有关三生石的任何景观。

三生石的开发还只是个例,实际上衡山作为南

宗禅之祖庭,同时也是净土宗三祖承远大师、四祖法照大师修行过的地方,著名诗僧齐己更是号称自己是“衡岳沙门”,可见仅佛教历史文化古迹就有足够的可开发资源。更何况衡山也曾是道教名山,被尊为紫虚元君的上清派开派祖师魏夫人,被唐代皇帝封为天师司马承祯、薛季昌,被宋代皇帝追谥这真人的前朝高道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徐灵期等“九仙”,都留下了不少文化古迹。除此以外,衡山的书院文化、南岳诗词等等,都是可以开发的文化资源。

总之,太多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未深入开发、宣传,希望今天的衡山旅游开发朝着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方向发展,让更多的游客认识到衡山除了自然美景之外,还有如此多的人文珍宝。

[参考文献]

- [1] 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J].学术研究,1987(1):53-54.
- [2]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619.
- [3] 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4] 赵娜.也谈跑江湖[J].华夏文化,2012(3):49-52.
- [5] 许源.庐山历代诗词中的地理认知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 [6] 严春华.三生石故事考辨[J].宗教学研究,2007(2):172-173.

Discussion On the Tourism of Hengshan Mountain in Tang Dynas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nyue Tourism

YAN Chun-hua, DAI Wei-hua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120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famous mountain position to the place of longing in the tourist's mind, Hengshan Mountain tourism in Tang Dynasty can not be neglected in the histor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ngshan Mounta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eng Mountain tourism category with relegation tour, landscape roaming, tour and travel for Buddh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ng Mountain tourism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pointed out,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se featu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nyue tourism is analyzed.

Key words: Hengshan Mountain; tourism; enlightenment

习近平理论自信系列重要论述研究

吴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赐予。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既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也与社会意识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有关,还必须联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与条件。增强理论自信,必须直面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的边缘化存在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相对薄弱的实际状况。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进一步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做出原创性贡献,进一步展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增强理论自信的着力方向。

[关键词] 理论自信; 理论自觉;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6-0020-06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1]深入阐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理论自信的系列重要论述,全面分析增强理论自信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积极探索增强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 理论自信提出的基本考量

关于理论自信,毛泽东作出过经典的概括:“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这是我们党对理论自信最集中最充分的表达。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近百年沧桑而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具有以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理论自觉。基于这一理论自觉,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使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始终不渝的指导思想。对于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今天谈论理论自信的命题,首先需要明确与澄清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赐予,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或理论的激励。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理论自信的力量源泉和最为深刻的根

据。正如习近平2017年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3]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精神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和科学理论在塑造出一个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同时,也赋予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政党特征和坚定的理论自信。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首先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因而宣示和强调理论自信具有理论优势自我表达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加速向世界中心挺进的卓越表现首先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收稿日期] 2017-12-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列重要论述研究”资助(编号:14ZDA003)

[作者简介] 吴波(1971-),男,安徽五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研究员。

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4]12}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相伴相随,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自信无疑是道路自信的逻辑必然,也构成文化自信的核心。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其次与当下社会意识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有关,因而宣示和强调理论自信具有积极的政治回应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社会思潮的争论,一直受到国内外关于改革方向错误论调的侵扰,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特殊景观。其中既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力鼓噪,也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懈推销。这些社会思潮以外部反思的方式无视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条件,将西方发展模式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案,试图影响中国改革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正确方向。当下社会意识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的强劲表演,无论在思想空间还是在实践空间都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这种实际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示和说明了中国道路探索的复杂程度和中国改革发展所处的关键阶段。就此而言,理论自信的命题的提出是有的放矢,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也蕴含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明确态度,可以视为针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正面回应。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还必须联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与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自信,不仅蕴涵有中国视野,也体现了世界视野,是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的统一。宣示和强调理论自信不仅具有社会主义在逆境之中自我正名的意义,也具有保持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低潮时战略定力的意义。且不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仅就背离和放弃社会主义这一实质而言,也不能得出这一历史事件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换言之,苏联社会主义的挫折,既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明,也不能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3]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自信,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话语,它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一起,汇合成中国自信的基本框架,是中国在经历苏联解体之后的困难期后向主动性姿态转变时释放的政治信号。

二 增强理论自信需要直面的若干重大问题

习近平指出:“理论上坚定成熟,什么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5]339}真正的理论自信,必须根植于对世界历史进程重大变化的科学认识和解决,阐明解决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不断增强理论创新的彻底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真正达及人们精神世界的最深处;必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改善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落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丰富生动的中国实践同时提出了增强理论自信的现实紧迫性,折射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

(一)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是增强理论自信需要直面的第一个突出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化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特征无法绕开的词汇,全球化的逻辑成为当下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机制。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性现象,具有显著的两重性,既内含创造文明的逻辑,也内含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两者相比较,“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更为根本”^[6]。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还不能只停留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的困境和挑战。全球化并没有像西方承诺的那样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的差距,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富两极世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挫者,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体”^[7]。资本在成就西方作为全球化发起者的同时,也为西方世界的危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